

薄姑国是商朝晚期的东方大国,活跃于渤海、济水一带。在新旧王朝更替中,薄姑国站错了队,周公东征时轻而易举将其灭国,随即土地归齐,间接促成了齐国的崛起。随后,薄姑故城当过奄君的监禁地,又做过齐国二十载的国都,见证了早期齐国的政治风云变幻。

商朝大国 享滨海之便利

“薄姑”一名最早见于西周的周公鼎铭文,但字作“專古”,与传统文献的写法不同。周人代商,在山东地区,鲁国承袭了奄国,齐国承袭了薄姑国,因此薄姑国对齐文化的塑造产生过深远的影响。

关于薄姑国的早期状况,《竹书纪年》有“太戊五十八年,城薄姑”的记载。太戊是商朝的第九位君王,太戊五十八年是公元前1580年,以此为开端来计算,至周公东征平叛管蔡之乱、薄姑国灭亡,薄姑国约存在了460多年。

有次,齐景公饮酒作乐,和晏子闲聊,至高兴处,发出了人要是能长生不老该有多快乐的感慨。博学的晏子见状,就开解齐景公道:“古而无死,则古之乐也,君何得焉?昔爽鸠氏始居此地,季萑因之,有逢伯陵因之,薄姑氏因之,而后太公因之。古若无死,爽鸠氏之乐,非君所愿也。”

晏子拿齐国大地的早期历史来举例,告诉齐景公,每个朝代都有自己认为快乐的事情,要真能长生不老的话,仍在人间的爽鸠氏所喜欢的东西,恐怕齐景公未必会接受。言外之意,就是告诉他别惦记长生不老这茬事了。

《左传》里记录的这个故事无意间梳理了齐地在远古时代的政权更迭情况。今天都说山东是齐鲁大地,可谁又曾知道,齐地最早是爽鸠氏的生活区域,夏朝是季萑氏,商汤时期有逢伯陵国,殷末是薄姑国,到周朝才成为齐国的地盘。

由此可知,薄姑国主要存在于商朝,在商朝末年崛起,打败了另一个强大的土著国逢国,逢国此后被迫西迁,搬到了济阳,于是薄姑国成为商末周初山东北部地区最强大的国家。

薄姑国的疆域与早期的

【山东古国系列之三十七】

晚商滨海大国,齐地昔日主人 薄姑国:

□张九龙

齐国有不少重叠区域。《孟子》有云:“太公之封于齐也,亦为方百里也。”也就是说,齐的封地开始只有一百里许。太公封齐后,又陆续接管了之前五个诸侯国的土地,分别是斟国、斟灌国、莒国、薄姑国和纪国。其中的薄姑国主要包括现在的淄博、滨州一带,是后来齐国的核心统治区域。

正如傅斯年所说:“薄姑地望正合于当年济水之入海口,是当时之河海大港无疑。”雄厚的经济实力首先是得益于优越的地理条件,与内陆国家相比,享河海之利的薄姑国自然发展得顺畅一些。

叛周被灭 惨遭残酷镇压

在政治上,薄姑国和东方不少国家一样,都忠心于商朝,这也是后来被灭国的主要原因,保存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中的周公鼎也证明了这一点。

周公鼎铭文记载,西周武王驾崩后,成王初立,周公

摄政,没过多久,武王的弟弟管叔、蔡叔结伙商纣王之子武庚和丰白、專古等东方国家部族联合叛乱,周公亲率大军东征,历时三年,胜利平叛。周公鼎就是在周公班师回朝后,由周成王下令铸造的。据文字学家唐兰先生考证,铭文中的“專古”就是薄姑国。

根据《竹书纪年》的记载,周公东征第一年里做了两件大事,一件是攻打奄国,一件是灭了薄姑国。如此看来,薄姑国这只“地头蛇”实力也有限,远没有办法跟周王朝抗衡,几乎是被周军一举就给拿下了。同时,这里也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,在山东地区,即使和奄国相比,薄姑国也是要弱一截的。

薄姑国被灭后,土地赏给姜太公,成了齐国的一部分。见奄国不好收拾,第二年,周公来了个迂回战术,先全力攻打南边的淮夷,又一路北上,收编奄国的附庸国,最后直捣黄龙,终于攻克了奄国都城。

三年下来,大小反叛国被尽数收拾,天下终于又要太平了。深谋远虑的周公把奄国的国君迁到了薄姑城,使其无法再兴风作浪,又把自己的长子封到了奄国故城曲阜,建立鲁国。上了这道双保险后,东方的新秩序终于建立起来,周公满意地班师回朝了。

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,周公对薄姑国采取了灭绝毁社的残酷政策。据李白凤先生考证:“在周人东进的过程中,它(即薄姑国)似乎是首先被打败、迁国、灭社的,几乎是覆灭得最惨的唯一东方氏族。”正是因为如此彻底地被摧毁,薄姑国才会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。薄姑国灭亡后,遗民被迫南下、西进、东往,走上了迁徙之路。

神秘故城 曾是齐国国都

薄姑城在哪儿呢?这个问题也是扑朔迷离,一般认为是位于博兴境内。不过,也有惠民、阳信、桓台、高青等多种版本的说法。

综合各种志书,清代学者叶圭绶认为“薄姑国城在东南十五里,今柳桥”,也就

是现在博兴东南6公里寨卜村北,小清河北岸的一处台地。这种观点得到了《山东通志》、《博兴县志》的认可。但因为当地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发现过相关实物遗迹,虽言之凿凿,但仍然不能平息千年来的学术争论,直到寨卜遗址的出现才有所改观。

1979年,寨卜村北600米处,东西向的小清河和溢洪堤之间的田野中发现了一处文化遗址。1981年开始进行调查,从地面采集到鼎、罐、盆、石镰、瓦当、网坠、纺轮、器盖和大量鬲、甗、鼎等器物残片。1982年和1986年,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部分地段进行钻探,钻探获得面积约16万平方米,发现了400米长的东城墙。墙基宽12米左右,夯土层厚近10厘米。

此处遗址东西长380米,南北宽约400米,面积约30万余平方米,文化堆积厚约3米,是以商周时期为主的遗址,兼有龙山文化及战国纪国至汉代遗存,被命名为“寨卜遗址”,是薄姑故城的“头号选手”。

各地争夺薄姑城,还因为它曾经做过齐国二十年左右的都城。太公之后,齐国局势大体保持稳定,但到第六代国君齐哀公时出现了动荡。齐哀公荒淫失政,与邻国纪国一直矛盾突出,纪侯便在周天子面前说哀公的坏话,周夷王把哀公给烹杀了。哀公死后,周夷王改立哀公的异母弟弟姜静为君主,这就是胡公。

当时政治权力的争夺异常激烈,作为齐国都城的营丘无疑会成为漩涡中心,既有拥护胡公的人,也有反对者,给胡公的统治带来威胁。因此,胡公下令将齐国都城迁到了薄姑城。

然而,哀公的同母弟弟姜山认为胡公抢了应该属于自己的君位,积怨在心,经过多年的准备后,率领他的党人以及营丘中反对胡公的人发动军事政变,进攻薄姑城。

胡公见大势已去,仓惶出逃,被杀死于博昌的贝水之滨。随后,姜山自立为君,是为齐献公,不仅把胡公的儿子们全部驱逐出境,还把都城迁到了临淄。此后,临淄作为齐国的都城,直至秦灭六国,天下归一统。胡公时期,薄姑城作为齐国首都,大约持续了20年。

【消失的古县】

繁华落尽寻齐东

□张永红

2017年春节刚过,位于高青县西部的张梦鲸墓被盗挖的消息引起社会关注,也使一个已经消失60年的古县——齐东县进入了人们的视野。

张梦鲸,原齐东县郭家庄人(现属高青县),万历年间进士,明末著名治世能臣,曾被崇祯皇帝誉为“卓绩天下第一”。他和另一位元代状元王文烨一起,成为齐东县的骄傲。

大清河古时横穿齐鲁,河阔水深,航运繁忙,在黄河未夺道入海之前,一直是一条西物东输、东盐西运的黄金水道。沿河流域逐渐形成多个繁华热闹的港口码头,齐东镇就是其中之一。金天会元年(1123年),在邹平大清河南岸的赵岩口码头(即今台子镇旧城)设立齐东镇,隶属于邹平县。百年以后的元宪宗二年(1252年),以齐东镇为基础,划邹平、章丘各一部分设立齐东县,隶属济南南路。元、明、清县治均设于此,这是齐东建县之始。相比前面介绍的几个千年古县,齐东县的历史要短一些,自设县到1958年被撤销,只经历了706年的时间。值得一提的,齐东县与省会济南颇有渊源,不仅行政区划上一直隶属济南南路、济南府,而且因其经济繁荣、商业发达,有着“小济南”的美誉。

齐东县因河而兴,又因河而衰。先因大清河航运而繁荣,又因黄河泛滥而衰退。齐东县地理位置优越,地处大清河和南北交通的交汇点,是当时著名的水陆码头。其北达京津,南通中原,东可入海,南北货物在此中转,鲁中所产布匹由此转运关东,其时,齐东县城财繁物茂,商贾云集,河中白帆点点,百舸争流,“小济南”之称名不虚传。

咸丰五年(1855年)黄河在河南省兰考县决口后,北迁夺大清河河道入海,大清河不复存在,水路运输随之而废。由于黄河水量大,流速快,且含沙量大,河床不断淤积抬高,故经常泛滥成灾。光绪十八年(1892年)黄河再发洪灾,河道南移,齐东县城被淹,繁荣长达640年的齐东县旧城就这样永远被湮没于黄河滩涂之中,这也成为齐东由盛转衰的转折点。

齐东旧城规模很大,东西长七华里,南北长六华里。东西门各有一石质大牌坊。县城中有文昌阁,也叫魁星楼,是为纪念元代状元王文烨而建。其底座为正方形,高20米,共三层,位于城中心的十字路口。底层四面是青砖拱形门,宽3米余,高4米余,来往车辆可从其下通过。二、三层均为六柱五门,造型雄伟,工艺精美,堪称齐东县的标志性建筑。解放初期,旧城的牌坊等遗迹尚存。1954年,惠民专署派人将牌坊等古建筑全部拆除,将砖石运往惠民县修筑黄河大坝。1973年黄河断流,河水干涸,当地村民曾在河底泥沙中扒出很多砖石和圆木桩,均为原旧县古建筑遗存,可以想见昔日古城的繁华和辉煌。

齐东县城于1894年迁至东南方向三十里的九户镇。由于失去水陆码头之利,加之战乱不断,“小济南”逐渐失去昔日繁华,变得风光不再。1950年4月齐东县治由九户西迁至麻姑堂(即今魏桥镇堂子村),隶属惠民专区。1956年再东迁至田镇,同时撤销高青县,并入齐东县。两年后的1958年11月,齐东县被撤销,同时恢复高青县建制。原齐东县辖区大部分划归邹平,另一部分划归博兴。

寿张、堂邑、清平、德平等古县被撤销后,都在原县治所在地留下了同名的乡镇,让人能够依稀感受到古县曾经的存在。齐东县建制被撤销后,并没有留下这样一个地方。随着时光的流逝,古县的印记日渐模糊。在昔日县治所在地邹平魏桥镇,有数条以齐东命名的街道。在青岛市南区的信号山公园以北,还有一条绿树掩映中的齐东路;在台北市繁华的忠孝东路与济南路之间,也能找到一条叫齐东街的幽静小巷。这让人在惊喜之余,更添一丝失落和惆怅。

【老照片】

“乌金”诗社

□高伟

这张照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参加新汶矿务局“乌金诗社”学习班时,与诗友们的合影。那时“文革”刚结束不久,国家经济蒸蒸日上,文学事业更是一派繁荣景象,当时有句话描述文学热潮:“树上掉片叶子,能砸着三个诗人的头。”

我所在的山东新汶矿务局是一家国有大型煤炭企业,坚持业余创作,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诗作的作者竟然多达百人,有几位写得非常优秀的青年诗人凭借实力登上了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人民日报》等大报大刊。矿务局为了把这群业余诗人“团结”起来,专门成立了诗人团体组织“乌金诗社”。矿区文联每年至少办一次骨干作者脱产培训班,这张黑白合影就是在一次培训班上“乌金诗社”骨干作者的合影。在这种氛围下,很多青年诗人冒了出来,还涌现出“父子诗人”“兄弟诗人”“矿长诗人”“司机诗人”等。

那时候,我还是一名煤田地地质勘探队员,常在野外施工,天天风吹日晒。但我没觉得苦,我的工包里除了换洗的衣服和饭盒外,每天总装着《诗刊》《艾青诗选》,还有一支钢笔和笔记本,我要随时记录创作灵感。那时候,农村的夜晚经常因为“压负荷”而停电,我便在幽幽的烛光下读书写作。每天太阳升起,我就骑着自行车赶到乡镇邮局,寄出我昨夜写的诗稿。在“石沉大海”般的漫长期待中,终于有了一点希望,我凭借在《新疆青年》《中国煤炭报》等报刊发表的诗歌作品,也成为“乌金诗社”的一员,每年都能够参加半个月的创作学习班,那是我 happiest 的日子。再后来,我还成了中国煤矿作协 and 山东省作协会员。

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,上世纪八十年代蔚为壮观的文学大潮已经归于平静,当年那群激情洋溢的煤矿诗人们,除了极少数仍坚持创作外,多数人早已远离诗歌,但诗歌永远是他们血管里曾经奔流的热血。今天,看着这张老照片,我怀念那些与诗歌相伴的日子,那么阳光,那么纯粹,那么温暖。

